

皓首学术随笔



戴逸卷

唐景林

任继愈

何明

袁震

吴元

吴小如

朱新

戴逸

Dai Yi
Juan

中华书局

C53
57
:7
2006

皓首学术随笔

戴逸卷

李桂林

黄裳

吴小如

任继愈

吴冠中

朱新厚

何怀宏

戴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皓首学术随笔.戴逸卷/戴逸著.-北京:中华书局,
2006

ISBN 7-101-05194-4

I.皓… II.戴… III.①社会科学-文集②史学-
中国-文集 IV.①C53②K207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69273 号

书 名 皓首学术随笔·戴逸卷

著 者 戴 逸

责任编辑 王守青
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
http: //www.zhbc.com.cn
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
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

版 次 200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

2006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640×960 毫米 1/16

印张 21½ 插页 4 字数 250 千字

印 数 1-4000 册

国际书号 ISBN 7-101-05194-4/K·2306

定 价 34.00 元



戴逸



中國人民大學

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

学术大师 黄宗羲

戴逸

新版《黄宗羲全集》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、篇幅最大的黄宗羲著作文集。今年是黄宗羲逝世310周年，新版《黄宗羲全集》的出版和我们在這裡举行出版座谈会，也是对他一个很好的纪念。黄宗羲寿命很长，活了85岁，著作很多有一百多种，一千多卷，但散失的很多，很可惜。现在浙江的学术界和出版社花了约20年时间（从1985年到2005年）来收集、编校、标点、校勘这么一部书，为学术界提供了一部很好的了解黄宗羲学术造诣和学

Add: No. 59, Zhongguancun Street, Haidian District, Beijing 100872 P.R. China [Http://www.ruc.edu.cn](http://www.ruc.edu.cn)

HA420604

地址：中国·北京中关村大街59号

邮编：100872

卷一 随感

传统和现代化 /3

谈学术自由 /6

边疆开发活动中的人和环境 /9

历史学家的过去和现在 /12

关于河洛文化的四个问题 /15

治史四要素 /23

资料 思想 文采 道德

——对历史学家的四项要求 /25

新闻和历史 /35

千成历史的启示 /37

卷二 史事述评

第一个洋务派集团的兴衰 /47

金田起义出大湟 /51

太平天国运动后清政府权力的下移 /56

戊戌改革的历史反思 /64

- 中日甲午战争与远东政治风云 /69
乾隆朝的水灾与赈济 /72
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新纪元 /76
清代开发西部的历史借鉴 /79
满族兴起的精神力量 /85

卷三 历史人物

- 慈禧奕訢斗法记 /93
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 /97
曹雪芹与平郡王福彭 /102
略论诗人乾隆 /105
抗法保台 功不可没
——纪念刘铭传 /108
我看张之洞 /115
爱国、先进的改革家、思想家谭嗣同 /119
雍正的廉政 /122
康熙和鳌拜 /126
学术大师黄宗羲 /132

卷四 师友与回顾

- 悼念尚钺同志 /137
从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光明大道
——纪念吴晗同志 /142
纪念郑天挺老师 /147
我所了解的历史学家邓拓 /153
回忆金应熙同志 /156

睿智的学者 勇猛的斗士

——忆黎澍同志 /158

与胡华同志相处的岁月 /165

哲人其萎 风范长存 /172

纪念马奇同志 /178

我的学术生涯 /182

我选择了历史专业 /193

初进北大 /198

回忆北京大学子民图书室的草创 /202

我的“处女作”

——《中国抗战史演义》 /208

卷五 学科漫谈

写群众的历史 为群众写历史 /215

加强对清史的研究 /226

应该建立“避暑山庄学” /235

历史科学的社会功能 /240

历史学要走出书斋 /243

中国档案与历史研究 /245

加强社会史的研究 /249

卷六 序跋书评

龙庭亦是豪游地 海月边霜未觉愁

——《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》序言 /255

失去了的机会

——《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》序言 /262

《顾炎武论考》序言 /276

- 《清兵入关与中国社会》序言 /278
《中华明清珍档指南》序言 /284
《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》序言 /287
《江阴历史名人漫记》序言 /290
《中国近代社会思潮》序言 /292
《考证学集林》序言 /295
中国留学教育的光辉道路 /298
《北京安徽会馆志稿》序 /304

卷七 杂录

- 圆明园与大观园 /311
纪念陈垣与开展区域文化研究 /315
借来斋记 /320
孙中山与北京平安大街 /323
清代宣南士文化 /327
北京的庙会 /330
世界一体化潮流中的桃源乐土 /334

卷一
随感

传统和现代化

我们当前肩负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大任务。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化有什么关系？我们对传统文化应抱什么态度？这是关系国家前途、民族命运的大问题。

文化传统，一般说来，是特定民族在历史实践活动中创造和积累的文明成果。它或者表现于物质载体，如建筑、雕塑、生产工具、生活用品；或者表现于语言文字；或者表现于抽象的性格、能力、民族心理、思维方式、生活方式、价值标准；或者表现于各种知识信息的积累、贮存。文化传统是时代的产物，是历史地形成的。人们今天的创造活动、文明成果，明天就会沉淀在历史的长河中，形成层层堆积的传统遗存。

我们每个人都在一定的文化传统中生活、成长，既不能脱离传统，也不能自由地选择传统。每个人都是在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哺育下生长，都在这一传统中获得知识，培养能力，形成思维和工作方式。传统和我们的关系与生俱来，十分密切，渗透在我们的每根血管中。我们都是中华民族伟大传统的儿女，对它当然有深切的眷恋之情。

但人类历史是不断前进发展的。传统只反映过去，一旦成为传统，它就凝固起来，成为历史的文化积存。它既保留、体现民族的优良特征，同时又偏离开日益发展的新生活，有时会和新生活发生严重的冲突。所以，传统是巨大的惰性。不管传统文化多么悠久、多么丰富、多么光辉灿烂，有时，它反而成为民族进步的沉重负担。传统，是旧生活的反照，不是新时代放射的光芒。

传统和现代化是历史发展的两个环节，相互衔接又相互矛盾。传统是昨天的创造活动的积淀，是已经完成了的过去式，是历史活动的终点。

而现代化是当前行动的目标,是前所未有的创造,是新生活的起点。现实生活,必然要冲击、改变旧传统,为自己的胜利前进开辟道路。担负着现代化责任的人,对传统必然是有所继承、有所改造、有所革新,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继承的态度恰当地说明了传统和现代化的关系。

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,根深叶茂,取得了十分辉煌的成就。对于我们的悠久文化传统应当珍惜重视,不能采取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,这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,中国的传统文化主要是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产生的,分散的小农经济、专制主义的官僚政治体制、宗法式的社会结构是中国传统文化赖以生长的基础,它反过来又为之服务,成为相对停滞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持。我们既要看到传统文化中精彩的要素、闪光的颗粒,又要看到它和现代化迥然不同的性质、结构和功能。而且,中国的传统文化,在一个孤立的、基本上隔离的环境中生长、发展,在近代以前,虽然也有中外文化的交流,有印度文化、基督教文化的影响,但作用并不大,并未改变传统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。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大的稳定性和排他性,适应变化的能力较差。

近代的资本主义入侵,使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,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,同时也传入了新的生产力、科学技术,产生了新的阶级和人际关系,输入了新的文化、新的生活方式,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的对立、冲突。许多人作过中西文化的对比,评论其优劣得失。其实,各个时代、各种类型的文化都有其产生的土壤和条件,各有其成就和局限,各有其存在的自身价值,本无所谓孰优孰劣。只是相对于现代化的目标,中国的传统文化远远落后于生活,不能成为救亡图存、复兴中国的精神力量。近百年来,我国的先进分子,探索救国之路,向西方学习,即是用西方的近代文化来代替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。西方的近代文化是一个整体,既包含船炮机械、科学技术,也包含民主、法制、人权,包含政治、经济、法律制度以及整套的世界观、历史观、思维方式、价值标准等等。其实,马克思主义正是西方近代文明的最高结晶。中国人民历经艰难曲折才找到了这一正确的科学思想。中国传统文化不能取代西方的近代文明,这是历史已作出的结论。任何要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安身立

命的精神堡垒,要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现代化动力的企图都是注定要落空的。因此,鼓吹回归到东方文明或儒学的第三次复兴都是不可取的。应当说明:吸收传统文化的某些要素,作为建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借鉴是一回事,而全面地回归和复兴传统文化是另一回事。为了创造新生活,最好是无情地和过去告别。在这里,脉脉的温情、美好的追忆、发思古之幽情都是无济于事的。《共产党宣言》中早就说过:“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。”

所谓“告别”和“决裂”当然不是一笔抹煞、简单抛弃,而是指社会主义新文化在整个体系上,在其结构、功能、价值观念上应迥异于传统文化,超越传统文化。文化建设不是靠口号、声讨、“大批判”所能解决的。重要的是切切实实地工作。艰苦奋斗、埋头苦干、点滴积累,从发展经济、普及教育、提高文化做起。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悲剧,记忆犹新,它以文化的“革命”、“破四旧”的响亮口号开始,最终走向反面,成为文化的破坏和旧传统的复辟,而且,复辟了旧传统中最阴暗、最消极的方面:专制主义、个人迷信、封建特权、文字狱、自大狂、闭关锁国、践踏知识与人权。“现代化”需要建立人和人的新关系,需要发展民主、科学、法制、尊重人的尊严和权利。现代化所需要的,正是传统文化中所缺少的。

今天的中国,仍然存在封建主义的残余,它是阻碍改革和进步的巨大阻力。讨论中国的传统文化,切不能忘记这个无情的现实。在肯定传统文化中精华的时候,要清醒地认识其中的糟粕,我们才不会感情用事,才不会丧失鉴别的能力,才不至于迷失方向。

(《文史知识》1987年第1期)

谈学术自由

这次作家协会开会,党中央鼓励文艺界创作自由和评论自由,历史学界也应当鼓励研究自由。自由地选题,自由地发表学术意见,自由地讨论和批评,这是发展历史科学的必需。

由是对必然的认识,不能把自由当做随心所欲。人们的行动要按规律办事,总要受主客观的制约。自由和必然,自由和法制,自由和纪律是矛盾的统一,世界上不存在那种不受任何制约的绝对的自由。自由和人类的实践相联系,人类越是进步,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越强,自由也就越多。自由和马克思主义不是对立的,恰恰相反,在马克思主义下才有最大的自由,社会主义制度应该比资本主义制度有更多的自由,并且只有在自由研究、自由讨论的环境中,马克思主义才能发展,马克思主义需要自由的土壤,否则,它便会僵化、变质、死亡。

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,那是通过理论的威力,通过讲理和说服,因为真理最有力量,真理迟早会令人信服,而不是以势压人,不是下达行政命令,那就不叫指导,而叫压服,或压而不服。我们不能像汉武帝那样罢黜百家,定于一尊,不能用政治运动、大批判的办法来对待学术问题,那是错误的、极“左”的做法。这种做法在十年动乱时期登峰造极,结果是万马齐喑,什么声音也听不到了,而马列主义也没有了,只剩一种声音,就是“四人帮”的帮腔,严重地摧残了科学。这种做法当然并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,而是歪曲、扼杀了马克思主义,千万要以此为戒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,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,整个社会经历了思想解放过程,从“四人帮”的压制下解放出来,取得了民主和自由。今天,学术自由比三十多年来任何时候都要充分些,因此出现了学术的繁荣气

象。所以能取得这样大的成绩,是由于党中央的正确政策,恢复了马克思主义,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,实现了较大的学术自由。

今后,历史科学的发展要继续提倡和发扬学术自由,贯彻双百方针,允许各种意见都摆出采,各抒己见,畅所欲言,进行心平气和的讨论,造成自由的学术气氛。我们可以不同意某种学术意见,但应尊重对方,虚心倾听不同意见,允许讨论和申辩,不能粗暴地打击。有的同志习惯于一种意见,碰到新的意见,新的想法,视为离经叛道,洪水猛兽。其实,学术界总有各种学派存在,各种意见存在,不可能“舆论一律”。学术上的“舆论一律”,定于一尊没有什么好处,也根本办不到,因为世界之大,事物之复杂,变迁之迅速,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可能全都一致。由于观察的角度、重点、方法不同,掌握资料的不同,认识深入程度的不同,因此产生各种不同的看法,人们总要有个认识、实践、再认识的过程,逐渐接近真理。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并没有什么可怕,马克思主义决不会因此垮台,正因为有各种不同的认识,才有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问题,引导主观的认识更接近于反映客观的实际。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很多不同意见的比较和辩论中,吸收合理的因素而丰富、充实起来。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偏狭的学派,而是集中全人类的智慧形成的。例如:有人用控制论、系统论、信息论或计量数学等研究社会历史,这不失为有意义的探索,尽管目前尚不完善,尚有缺点,应该鼓励这种探索,而不应排斥、打击。

我们面临对外开放的新形势,学术界要能适应这种新形势。随着对外开放,各种思潮、观点,正确的和错误的,都会在国内传播,凡是学术上的不同学派、不同观点,只要不是在政治上捣乱,不触犯法律,都可以存在,实行最充分的学术自由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,可以研究马克思主义,在社会主义社会中,也用不着害怕研究各种各样的主义,如果有合理的部分可以借鉴、吸收,如果有错误的东西,也可以知道它错在哪里。对当代世界上的社会科学成就不闻不问,拒“敌”于国门之外,自我封锁,结果反而使我们的学术界闭目塞聪,孤陋寡闻。

邓小平同志提出“一国两制”,这是马列主义的新创造,是古今中外、史无前例的,解决了香港问题,今后也可以解决台湾问题和世界上的其他

问题。一个国家内,两种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可以较长期的并存,也必定要允许两种或更多种的思想较长期的并存,因为思想是上层建筑,是政治和经济的反映。我们要学会适应对外开放的新形势,正确对待不同的学术意见,实行最大程度的学术自由。譬如今后和香港、台湾的学术界交往,或者和外国学者交往,就不能要求人家都是唯物史观,都信奉马列主义,在学术上也可以求同存异,要有学术上的雅量,不能戴上“左”的有色眼镜,挑错找岔,唯我是从,对人家开展大批判,无限上纲,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起来。这种粗暴态度就谈不到和港台学者的交往,也谈不到开展正常的国际学术文化的交流。

我相信,今后历史学界对“百家争鸣”的方针将会贯彻得更好,将鼓励更多的学术自由,而这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最强有力的杠杆。

(1987年)